

金刊名国

笑傲霜天

◎《鲁迅风》《杂文》散文随笔选萃

王国绶 选编

“花动一山春色”。
民国文坛，大师辈出，
由此成就了一批争奇
斗艳的文学名刊——

《小说月报》、《语丝》、
《现代》、《文饭小品》、
《太白》、《杂文（质文）》、
《论语》、《人间世》、
《逸经》、《鲁迅风》、
《万象》、《野草》……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民国名刊简金

天 霜 傲 啸

——《鲁迅风》《杂文》散文随笔选萃

王国绶 选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谨 启

本丛书所选民国时期文章,距今时间既久,又涉及作者众多。人世沧桑,我们很难与这些作者一一取得联系,故恳请书中收有其文章的原作者与本社文史编辑室联系。至为感荷。

霜 傲 天

——《鲁迅风》《杂文》散文随笔选萃

王国绶 选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50千字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

ISBN 7-201-03025-6

I·138 定 价:15.00元

版 出 日 一 十 月 十 年 八 十 二 國 民

www.merck.com

我們是仰慕過先生，那是無用多說的，為天之下，浮塵之上，芸芸衆生，能夠超越先生者，何曾風乎！我們本體是萬千人的少數幾個，我們知道過先生者不深，與佔片光言時，聊覺欣然有得，其實還是一無所知，還是求教所難，幾可奈何的。

以政治家的立場，來估量過先生，毛澤東先生說他「是中國的第一等學人」，而且「是中國的大學人」，我們立為國際學徒，感

傅增湘先生是文壇的宗匠，於於有得我們取法。隨着傅先生進的會生課，他所研究的學術範圍之博與精到了今天，我們實在還沒有找到第二個人。他有豐富的科學知識，他有廣遠的國學根柢，他極其勤奮敏銳，他正襟危坐嚴謹，他是無以倫比進入，他是卓絕的交際作品，其定了中國新文學的國民地位，而做一切，傅先生都以身作則極其徹底。

更應該學習胡先生的鬥爭精神所附屬的學術訓練，沒有這裏談，也沒有外兄先生的鬥爭精神，這就是自明之理，無煩我們的叨叨；然而我們將怎樣來接受這一份遺產，命着魯迅先生所走過的，所指着的路走去，這是我們日夜懷思而企求着的。

四、各人的更談不同，學界互異，學界孤傲，並非絕對的事。

「但是這之乎者也，而未必能讀之乎者也，說『我！我！我！』但『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識字，心嚮往之，一則是我們微末的心願，與衆不同，未非所可。」

生在鬥爭的時代，是無法達到和平的。探長魯迅先生使用武器的秘訣，使用我們可能使用的武器，要當當的大膽：說我們這班物有些『用意』，那便是唯一的『用意』了。

魯迅先生書簡

「魯迅風」與魯迅……………景▼宋

石

四錄

紅姑娘
……
梓芳

游擊的雜感

吉方

和後語

11

和歌人
源夢生

強行入
來小

紅樓夢
服務社

西秀路起飛山場

分其利也。而訟之者三。四九時。

100

《鲁迅风》创刊号封面

第十四期

鲁迅风

《鲁迅风》封面之一

雜文

小山內藏



島村抱月

已呈請
日本帝國
內務省
登記
中華民國
留日監督
署登記

第一號

日本三個演劇改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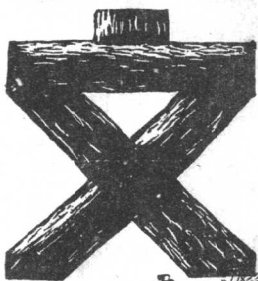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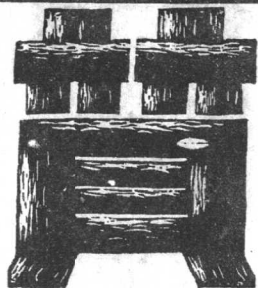
坪内逍遙



上海羣衆雜誌公司總經理

《雜文》創刊號封面

WAHRHEIT UND DICHTUNG



號四第

ЛУЧШЕ ПОЗДНО, ЧЕМ НИКОГДА



《质文》封面之一

序

舒 芜

文学期刊的出现，是文学传播上的大事，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大事。先前，诗文写成，达到读者，只靠口耳传诵，笔墨传抄，既慢又贵且零散；从而，作家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作者与作者、作品与作品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背景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效果的关系，等等，都是松散的，迟缓的，辽远的，朦胧不明的，难以预计的。即使在名山胜景、邮亭驿馆的壁上题写，在盛会雅集沙龙中吟诵，影响可以扩大一点，经久一点，究竟也很有限。印刷术虽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其用于文学作品，长时期只是为前代作家或自己晚年才刻成集子，慢慢送人，不用于随时写成的单篇文字，除了进学中举点翰林时的刊文之外。而自清末始有文学期刊、民国20年代始有新文学期刊以来，情形大为不同了。一篇之出，短则以周计，长亦不过以年计，可以克期印成千万份，与千万读者相见。而且，还有别的作者，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以同一体裁品种或不同体裁品种的作品，同时在一本期刊上与读者相见。并且这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是一段时期内总有某个期刊杂志在那里定期出版，作者甚至可以每期都有作品在那上面与读者相见，读者也可以期待着常在那上面见到哪些作者哪些作品。这样，作者就会相当明确地知道自己是写给哪一类读者看，大致有

△
房
▽

多少读者，知道读者大致会怎样接受，欢迎不欢迎，考虑要不要适应读者，或是引导读者，或是改造读者，或是有意与读者为敌；也大致知道自己在这上面将与哪些作者哪些作品为伍，考虑要不要适应他们，或是我行我素，或是有意立异，或是委而去之。有了文学期刊，所谓“文坛”的“坛”才有了实物，“坛”就是主要由期刊组成的。新文学对旧文学的迅速胜利，就表现在新文学期刊在全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占领了期刊就是占领了文坛。新文学运动以来，认真努力作旧体诗文的人一直未绝，仍自有其师承流派，也有成就颇高的；然而，他们没有什么期刊，偶有几个也势孤力薄，不成气候，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坛”，就显得溃不成军了。有了文学期刊所组成的文坛，而后才可能有职业半职业作家。每种文学期刊有一个主编或编辑部，在作品的催生、接生，促进、促退，安排、协调，组织、引导等方面起着很大作用，在作者与读者的联系中起着很大作用，在作者与文学市场的联系中起着很大作用，这一角色是先前的文学史上所没有的，他给文学史带来许多全新的东西。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晨报副刊》，没有“开心话”这一栏的设立，没有孙伏园，没有孙伏园与鲁迅的关系，没有孙伏园善于笑嘻嘻地催稿，就不会有《阿Q正传》，或者不会在那个时间写出来，或者不会是现在这个题目这个样子。《阿Q正传》如果是在没有文学期刊之前写出来的，即使能达到“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也不会在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危惧不安，恐怕以后要骂到自己头上，从而对作者为谁作种种猜测，多方打听，先是到处说《阿Q正传》处处在骂他、后来又逢人便声明不是骂他这些戏剧效果。甚至，孙伏园如果不是离开北京一段时间，《阿Q正传》就会比现在长些，阿Q被枪决就会迟些。

研究晚清以来的文学史，特别是研究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史，当然要研究各种别集、总集、长篇专著，但单是这样还不够，还必须研究各种文学期刊（以及有文学作品的综合性期刊）。一个文学期刊，往往大致上体现一个流派、一种主张、一种倾向；即使不是同人刊物，而是商业性刊物，也仍然有一个大致共同的倾向。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作品的“语境”，作品中未明言的所指，作家之间的关系，作家作品在当时的地位、作用、影响的比较和受读者重视欢迎的程度的比较。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文学流派倾向的全貌，看清一个个文学流派倾向如何以其全部作品而不仅是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在起作用。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一个文学论争（也有些不纯是文学范围上论争）的全貌，看清论争的起因、发展、结局，看清论争各方的是非得失。鲁迅斥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近十多二十年来，时常被举为鲁迅如何“尖刻”如何“不宽容”的例子。只有研究了当时的有关期刊，才看到其实是梁实秋首先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么一个文艺理论上的问题，引到“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卫苏联’”的问题，引到“到××党去领卢布”的问题，给论敌扣上一顶当时千真万确会招来杀身之祸的红帽子，这才看得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称实在还是很宽厚的，这是近来逐渐有人弄清楚的了。

新文学运动以来，可以肯定地说，散文的成就在小说诗歌之上；鲁迅、周作人两个高峰的创作成就主要都在散文方面，就是证据。要研究新文学的散文方面的历史，尤其要研究文学期刊。除了上述理由之外，特别还因为，散文多是短篇小幅，无论是再现现实，还是表现自我；是针砭时弊，还是抒写性灵，多是一片一面，一花一叶，所以更需要从文学期刊上来研究，才能够把每一篇散文作品放在其具体“语

境”中，同一流派倾向中，不同流派倾向的竞争中来理解。

新文学中的新散文，滥觞于《新青年》的“随感录”。《新青年》不是文学期刊，后来它一分为三：后期《新青年》继承了前期的政论而外，《小说月报》继承了它的文学方面；《语丝》继承了它的社会文化批判方面。《小说月报》原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是商业性的文学期刊，商务印书馆不能不任命沈雁冰（茅盾）出来接任该刊主编，是鸳鸯蝴蝶派失去了读者失去了市场的反映；沈雁冰接编后把它彻底改造为文学研究会的阵地，则是新文学的一大胜利。《小说月报》以小说和文学理论为主，其所载的散文随笔，常常带着小说的印迹，是后来的社会速写报告文学的先声，代表散文的一个重要方面。《语丝》则是第一个散文刊物，其主要人物是鲁迅、周作人兄弟，其共同点是充分发扬主体性，任意而谈，批判旧的，催促新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后来周氏兄弟分道扬镳，周作人从“我思故我在”的立场，坚持思想自由、个性自主，在其领导或影响下，出现了《论语》、《人间世》、《逸经》、《文饭小品》等散文随笔刊物，被论者称为“闲适派”。鲁迅则从“我在故我思”的立场，坚持面向人生，解剖黑暗，在其领导或影响下，出现了《太白》、《杂文》、《鲁迅风》、《野草》等杂文小品刊物，被论者称为“战斗派”。这两个称呼未必十分贴切准确，但大致可以说，二者正好分别代表《语丝》的一面，是《语丝》的一分为二。二者曾经尖锐对立，今天从文学史的宏观上看，又未尝不可以说是合二而一，共同发扬了《语丝》所开创的光辉传统。此外还有比较中间比较兼容并蓄的《现代》和《万象》，二者不纯是散文刊物，而所载散文亦有相当分量，很值得注意和研究。

上面说的《新青年》之后的十种新文学期刊上的散文，

大致包括了新文学史上民国时期的主要散文。现在按期刊分别选集，较常见的名家名作，也与同一期刊上较不常见的作家的优秀之作选在一起，这样就接近于以期刊为载体的散文发展史的“原生形态”，带露沾泥，生香活色，读起来与读作家专集或他种选集不同，那些多少有些折枝花的味道。对于爱好散文的读者和研究散文的研究者来说，这是我们敢于说这套选本有他种选本所不能代替的价值的理由。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舒芜序于碧空楼。

前言

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刊物尤其是同人刊物，常常是某种文艺思潮或文学主张的发源地和阵地，乃至因此而促成一种文学流派或群体的形成。《鲁迅风》和《杂文（质文）》月刊在那个政治高压、民族危亡的年代，由于同样注重以鲁迅式的战斗的杂文，针砭种种恶势力以及消极的社会现象，因而形成了两个风格特点十分接近的文学群体。这两个群体的杂文创作，成绩卓著，特点鲜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相当的影响。把这样两个不同刊物的随笔文章编选在一起，正是基于以上一些因素的考虑。

《鲁迅风》是抗战以后，以滞留在上海租界地“孤岛”的进步的、爱国作家为主的同人刊物。作者多系此前的左翼作家。它的问世，其实与一场关于杂文的论争有直接的关系。

1938年在上海，“孤岛”文坛围绕着如何估价鲁迅杂文的价值和继承鲁迅杂文战斗传统这一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论。巴人（王任叔）发表《超越鲁迅——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而作》一文，主张要继承和发扬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阿英则发表《守成与发展》，认为鲁迅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该再写“鲁迅风”式的杂文。一批作家先后卷入到这场论

争中，双方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为了结束论争，团结对敌，进步文艺界召开了双方的座谈会，同年12月28日，应服群（林淡秋）、巴人、阿英等37人联合发表《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一文，肯定鲁迅杂文的价值和继承鲁迅杂文传统的重要性，宣告论争的结束。但对于“鲁迅风”杂文的贬低和否定，实际上却并未停止，《华美晨报》和《中美日报》仍然继续发表有关的文章。就在这种气氛下，文载道（金性尧）、巴人等于1939年1月11日创刊了《鲁迅风》。

《鲁迅风》，16开本，起初是周刊，自同年5月20日第十四期起改为半月刊。编辑人借用的是当时上海一位小型报的编辑冯梦云的名字，实际上则先后有文载道、巴人、东方曦（孔另境）、石灵等人。继承鲁迅战斗风格的杂文是《鲁迅风》的主流内容；主要撰稿人有景宋（许广平）、风子（唐弢）、柯灵、石灵、辨微（周木斋）、吉力（周黎庵）、苗埒（周楞伽）、巴人、宛宛（黄裳）、恽逸群、文载道、锡金等人；同时还拥有陈望道（齐明）、郑振铎（源新）、巴金、萧红、萧军、王统照、骆宾基、魏金枝、李辉英等一批名家；文章则以尖锐锋利著称。该刊标志着“孤岛”进步文艺界坚持杂文运动的重大努力，对于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成为“孤岛”时期一份影响颇大的文艺期刊。1939年9月5日，《鲁迅风》在出版了第十九期以后宣告终刊。

《杂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主编的文艺月刊，24开本，1935年5月15日创刊于日本东京。杜宣、邢桐华（勃生）先后担任主编。该刊出至第三号以后，被日本当局查禁，于是便采用“钻网术”，从第四号起易名为《质文》，继续出版。该刊在日本编辑，却始终在上海发行，同当时国

内的时局和文坛息息相关，联系十分密切。尤其是自第二卷第五、六号合刊起移至国内印刷，这种联系就显得更为直接和紧密。顾名思义，《杂文》以发表杂文为主，它的确也是30年代一份著名的杂文期刊。鲁迅、郭沫若、茅盾都曾为它撰稿，给予过有力的支持。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和《从帮忙到扯淡》，就是在该刊面世的。郭沫若更是该刊的实际领军人物，他的一组历史随笔，曾经影响一时。此外，在该刊主要撰稿人当中，还拥有魏猛克、任白戈、欧阳凡海、林焕平、林林、张香山、陈北鸥等一批风云人物。《杂文》的文章以现实性和战斗性而受到读者的欢迎，成为30年代左翼文学中影响较大的刊物之一。该刊出至1936年11月10日第二卷第二期以后停刊，总共出版了8期。

从史的意义来说，《鲁迅风》和《杂文》均诞生于30年代这一中国光明社会到来之前的最黑暗的年代。正是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剧烈的社会斗争，为两刊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契机。这从两刊的创办宗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杜宣在刊于《杂文》第一号卷首的《关于杂文》中公开告白：在这个时代，杂文“有它的特殊力量，它是运用明快清晰的手腕来分析批判所发生的每个社会现象。”

巴人为《鲁迅风》撰写的《发刊词》则在引用毛泽东赞誉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的话语之后，更为明白无误地宣告其完全在于“沿着鲁迅先生所走过的、所指示的路走去”；“生在斗争的时代，是无法逃避斗争的。探取鲁迅先生使用武器的秘奥，使用我们可能使用的武器，袭击当前的大敌；说我们这刊物有些‘用意’，那便是唯一的‘用意’了。”

两刊定位于此，表明它们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意识到了作为文学刊物所承担的历史职责和所应用的品格，体现了在中日反动派暴虐统治下激发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和争取

△
前

言

▽

民族解放的时代精神。

60年过去了。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去浏览这两份刊物里的文字的时候，强烈地感受到，在那样艰难的时代条件下，两刊的编者和作者顽强地坚守着文学的阵地，继承着鲁迅的战斗风格，努力创作，认真办刊，虽然不能说一切尽善尽美，其宗旨毕竟难能可贵，其成果也确实来之不易，理应得到后人的缅怀和珍惜。

作为注重杂文的文艺期刊，两刊尽管也发表创作、理论、译介、作家书简、日记、消息之类的作品，但无论《鲁迅风》还是《杂文（质文）》，随笔文章的份量都是比较大的。这些随笔，在体裁、形式方面，有时难以划一，因此在概念上可以作广义的理解。其中既包括杂感、小品、历史随笔，也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狭义的“散文”，以及文艺通讯之类。本书编选的主要就是这类作品。这些随笔，是《鲁迅风》和《杂文（质文）》为自己留下的最鲜明的印记。

这些随笔的特征首先是题材的宽阔和丰富。在入选本书的随笔中，多数篇章是战斗的杂文，当然也有非战斗主流的文章。从题材上分析，其中有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有鞭挞敌伪汉奸等民族叛徒的，有反映社会动乱、人民苦难的，有表现中国军民抗日救亡的，有揭露当局腐败统治的；也有评析艺文、针砭文坛时弊的，有揭示批评落后的时风世象的；还有抒写人生感悟和写景、描述人情风俗的等等。从中可见，作品的触须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公开地揭露黑暗，热烈地歌颂光明，对生活的表现可谓既丰富又深入。比如《周案余墨》，从周作人遇刺事件谈起，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汪精卫等民族叛徒，极具杀伤力。《教士的工作》则对当时正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者进行了巧妙的暴露和辛辣

的嘲讽。《乐祸篇》、《街头杂写》诸篇，抓住生活中的消极事物，痛下针砭，令人警醒。郭沫若、郑振铎的历史随笔，则是借古讽今，旨在启发民众的抗日爱国的觉悟，显示出一种历史的纵深感。而本书所辑“四海采风”一组文章，或写人、或叙事，都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时代的风云。其中，既有人民的苦难，也有人民的觉醒和抗争，尤其是关于新四军和徐特立的生动描述，无不使读者从中看到了民族和人民的希望。文艺随笔文章如唐弢的《鲁迅的杂文》，对鲁迅杂文所进行的条分缕析的阐述，剖且分明，见解独到，历来被视为鲁迅杂文研究的经典之作，但其主旨并不仅仅为了研究鲁迅，为当时正在勃兴的杂文运动提供师范的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诗的独白》则以诗一样的语言论诗，独抒己见又新颖深刻。此外，巴金的书评随笔、杜宣和魏猛克的文艺杂文，也都是激浊扬清的好文章，显示了当时进步文艺界为文艺的健康发展所进行的宝贵的努力。至于抒写人生感悟的随笔，那也很多。如唐弢的《心的故事》等，文采飞扬，思想深邃，很有几分鲁迅《野草》的味道。徐訏的《晨星两三》，语浅而言深，对生活的认识充满着睿智，颇有大家风度。此外，几篇人物纪念文章，归根结底，抒发的也还是对人生、社会的具体感悟，写出了史识、今识、文识，既显示真知灼见，又充满着温馨之情。

总之，题材的广阔增强了作品选材的张力和思想的内蕴，使得这些随笔文章成为当时那个时代中国社会人生的真实记录，勾勒出中华民族的一部痛史，值得作为一笔有价值的文化遗产留给后人。相信今天的读者会从中寻找出对于自己有用的东西的。

灵活多样的形式、迂回曲折的章法，是本书入选随笔另一个鲜明的特征。在多种文学体裁中，也许要数随笔是最为